清史纂修

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建构*

——以清代《江夏县志》与民间文献《灵泉志》的对比为中心

张小也

明末清初，湖北江夏有人编纂了《灵泉志》一书，[①]它围绕明代楚藩强占灵泉山（今江夏龙泉山风景区——笔者）为陵寝的事件搜集了大量文献，其中主要是族谱、文集与民间口碑传说，惜已无存。清嘉道年间，地方文人汤铭新、汤又新兄弟发现了它的一个残本和一个抄本，他们利用正史、方志与其他文献对这两个本子进行考订，形成了他们认为是“善本”的《灵泉志》[②]，今有抄本藏于湖北省图书馆。毫无疑问，《灵泉志》对于研究明代藩王和湖北地方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材料和编纂方式客观上反映了地方社会的自我认知过程和地方史（包括家族史）的建构过程。

在对《灵泉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同治八年的《江夏县志》参考了《灵泉志》，进一步追溯之后又发现，在历次修撰过程中，[③]《江夏县志》不断吸收民间文献与口碑，内容不断丰富，在地方史建构方面发挥着作用，这些都与《灵泉志》存在暗合。本文即以《灵泉志》中的内容为主线和参照物，[④]将不同时期的《江夏县志》与这些内容进行对比，从中分析其变化过程。

康熙朝《江夏县志》

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编纂地方志。“自康熙朝起，方志修纂开始大规模进行，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之需，康熙帝采纳后诏令各地设局修志，责成学政检查志书的质量，后来又限期成书。”[⑤]在这种大背景下，有记载的《江夏县志》的纂修活动在康熙朝多达五次，至今仍保存的是其中三次的成果。

一、康熙朝五修《江夏县志》考

因康熙一朝多次修纂《江夏县志》，或成书或不成书，成书者有存有佚，存者则分藏于不同的机构，研究者未必皆能得见，所以对它们的介绍说法不一，这里仅就笔者所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康熙二十二年志，今已不存

此次修志由时任知县的刘朝英主持，教谕张希良编纂。[⑥]江夏“自明洪、永以来未有志”。万历九年，知县莫某因清仗土地事务结束，“始为田赋书”。万历十九年，邑人郭正域“益以山川、方域、坛祠、公署、先贤、仕籍、科目、女贞、仙释”，使其初步具备了县志的规模，被后世称为郭志。[⑦]张希良指出，郭志的特点是“典而略”，因此对于诗词、歌赋、序言、题记基本都不予收录。而记载江夏地方史的一些文献，如《唐艺目》、《武昌先贤传》及《鄂州图经》等，亦“未尝援证”。总之，郭志“严肃有余”，所以地方上那些“轶而弗彰”之事往往失载。[⑧]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张小也（1970—），女，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088

至康熙十二年，因朝廷下诏令直省编纂通志，开江汉志局，始修《江夏县志》。然而不久，三藩之变起，修志被打断，终于未能完成。此后有叫魏廷谟的人自己做了些拾遗补阙的工作[9]，附在郭志之后，留下“残简数帙”。[10]

刘朝英任江夏知县后，非常重视修纂县志，在地方事务和军务并举，“血尽髯枯，日不暇给”的情况下，仍坚持修县志，兴文事。康熙十九年秋，他将纂修《江夏县志》之事委托给他认为“学奥而品端，具三长之才”的教谕张希良。张希良此前于修志之事亦颇留心，[11]“屡经推毂，著书等身”，因此“慨然任其事”。他手披二十一史，孜孜不倦，又搜集“碑版遗文及耆老耳闻目睹之事”，一一予以记载。稍有闲暇则伏案疾书。经过三年时间，四易其稿，终于成编，共四十五卷。其中包括“星野之区分、山川之绣错、沿革之异同、兵戎之绎骚、财赋之登耗、风俗之醇浇、吏治之贤否、人物之盛衰”等内容，是一个规模完备的县志。[12]刘朝英对于此次修成的县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质而文，简而该”，其主旨“有卫名教，裨益政治”。[13]然而，这一次修成的《江夏县志》毁于战火，其部分内容为后来所修的县志所吸收。

2、康熙三十五年志，今已不存

此次修志由时任知县的洪国辅主持。[14]他认为，“志也者，所以志山川、疆域、户口、人物之数也。”特别是江夏这样的地方，“鄂渚雄邦，控据上游，包群山而为垒，扼束江汉，襟带吴楚，省会名区也”。其山川形胜，风土人文，即便是“崔子诗篇，祢君锦赋”，[15]尚不足以描述其万一。因此，自上任以来，虽然事务繁忙，但他仍以采风问俗、搜求文献以备考为应尽的职责。此前修竣的康熙二十二年志于二十七年遭“夏逆之变”，[16]已经散失，幸存部分也大都是从灰烬之中抢出的，损毁十分严重。洪国辅与教谕刘公亮、县丞赵敬修及原觇之等补阙拾遗，命工匠刊刻成书。[17]

3、康熙五十三年志，五十二卷

知县陈万策主持修纂。虽然洪国辅序中有“告成”之说，然而从康熙五十三年志的序言来看，[18]康熙三十五年志可能实际上并未修竣。陈万策说“下车之始，例有邑志呈阅，但残篇断简，或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疑信参半，盖前任洪君修辑而未竣故也”。他在公务之余搜取材料，详加咨访，举凡地理、建置、人物、艺文、赋役、忠孝节烈等方面的内容，无不考订核正，“滥者删之，缺者补之”，在旧志的基础上分部成帙。自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五十三年止，三十年间有关国计民生、风土习俗的内容，“悉为修载”，内容丰富。[19]今有刻本藏上海辞书出版社。

4、康熙六十一年志，二十二卷

知县潘榮鼎主持修纂。[20]他在序言中回顾了历史上《江夏县志》的修纂过程“郭文毅旧有编录，几经兵燹之余，残缺既多，张太史石虹详加裒辑，然历今又将四十年。”[21]从内容来看，六十一年志对于五十三年志有极强的继承性。国家图书馆有藏，有缺文。

5、抄本《江夏县志》，四卷

关于这一版《江夏县志》，言者多语焉不详，只有《武汉旧志序跋》明确指出此志就是康熙二十二年志“《江夏县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抄本，马仲骏纂修。此书四卷，缺卷一。今藏北京图书馆等处。”[22]然本文前引各种序言说的很清楚，主持纂修康熙二十二年志的是知县刘朝英，具体工作由教谕张希良承担，且全书有四十五卷，这些均与抄本《江夏县志》不同。查六十一年志“秩官”部分，至潘榮鼎为止，清代历任江夏知县十九员，其中第七人名马中骏，宜阳举人。在抄本《江夏县志》的“秩官”部分，“国朝”知县的名单至马仲骏为止，为河南宜阳人，辛卯举人。以此推知他与六十一年志中的马中骏当为同一人。二十二年志的主持者刘朝英为第十四任知县，可见抄本《江夏县志》的时间早于二十二年志，应该就是刘朝英在序言中提到的，应康熙十一年纂修通志之诏书而修，但格于兵火未能修竣的《江夏县志》。这样看来，在现存《江夏县志》中，此康熙朝抄本年代实为年代最早。

二、现存康熙朝《江夏县志》与《灵泉志》的对比

这里将现存的康熙抄本志、康熙五十三年志、康熙六十一年志中与《灵泉志》中的相

关内容进行对比。 如下表所示。

1、山川名胜，其中一些可资比较的条目

表 1

康熙抄本志	康熙五十三年志	康熙六十一年志	《灵泉志》
封建亭，明太祖既破湖广，驻跸此山，报第六皇子生，太祖悦曰：他日以此子王楚。及封王，议齐，宝三铸不成。因忆曰：朕昔驻湖广梅亭山，有言其王楚乎？一铸而宝成，遣赍御制祝文祭告封内山川，勒碑建亭。（胜迹。）	封建亭，在新南门子城上梅亭山埠，明太祖兵取湖广，驻节此山，报六皇子诞生，上悦曰：他日以此子王楚。及封王，以昭王齐，宝三铸不成，廷臣密奏，上闻骇异，一日忽记曰：朕昔驻梅亭，其王楚乎？一铸而宝成。洪武三年四月初七遣御制碑文遣官设祭，告封内山川，因亭于此，以载碑也。（第五卷，古迹）	封建亭，明太祖取陈理，驻节此山，报第六子生，太祖曰：他日以此子王楚。及封王，议予齐国，宝三铸不成。因悟曰：朕昔驻梅亭，有言其王楚乎？一铸而宝成，遣赍御制祝文祭告封内山川，因建亭勒碑其上。（卷之五，古迹）	先元顺帝二十四年甲辰，太祖兵破湖广，驻节梅亭山，在使报皇子生，上悦，问左右曰：此何地？曰：楚地。曰：他日以此子王楚。指黄龙寺塔为殿基，未逾月，寺焚。及后即位，封诸子以王，以桢王齐，宝三铸不成。上曰：我昔破湖广，驻梅亭，曾云以此子王楚。宝成，遣方士赍御制祝文，祭告武昌封内山川，今有封建亭云。（原序）
九峰寺，离城五十里，明洪武初楚昭王为僧无念建。（寺观祠庙）	九峰寺，在县东五十里，洪武初楚昭王为僧无念建，明谭友夏、冯畏庵诸名士多读书其中，今颇废。（第九卷，祠庙，寺观附）	九峰寺，在县东五十里，洪武初楚昭王为僧无念建，明谭友夏、冯畏庵诸名士多读书其中，今颇废。（卷之九，祠庙，寺观附）	明楚昭王出猎，逐白兔于九峰狮子山，见李氏墓，竟夺其地，掘唐相李鄘之棺。都堂李盛死之，英灵不昧，每与王较。王惧之，平其冢以为寺，约茶、盐二客，出赀巨万，使内官郭成功监修，埋僧人无念于上，作千佛殿以压之。李为祟不已，因修李公享殿，塑像以祀之。（邹振奇 《建李都堂盛神像》）

2、典章制度，可资比较的一些内容如下表所示。 其一、荐辟

表 2

康熙抄本志	康熙五十三年志	康熙六十一年志	《灵泉志》
曾泰，洪武初以秀才征，学行允孚，上重之，每慷慨论事，言无不从，超拜户部尚书。 辜梟，洪武初知饶州德兴县，招抚流亡，聚兵障寇。时开矿榷铜，为民患，奏请罢之。乃修学校建桥梁，扩榛芜，鸡犬相闻，遂为乐土。（选举）	辜梟、曾泰（后补：田大圭、刘维。第十八卷，选举）	（缺文）	明兴，圣天子崇儒重道，求贤若渴。洪武五年岁次壬子，遣御史大夫降诏书于廷曰：“……昔年康茂才，荐江夏贤士三人，曰辜梟、曾泰、张诚……汝御史张育，载厚币以聘，务令安车就道，来游于廷。如果才堪重任，社稷之庥，苍生之福也，朕将虚左以待。”（董礼 《乡贤祠书》）

其二、乡贤祠

表 3

康熙抄本志	康熙五十三年志	康熙六十一年志	《灵泉志》
	户部尚书曾公泰、工部侍郎刘公仲廉、御史巡按云南张公璞（第七卷，学校）（注：笔者选取的是见于《灵泉志》的三人）	户部尚书曾公泰、工部侍郎刘公仲廉、御史巡按云南张公璞（卷之八，学校）（注：笔者选取的是见于《灵泉志》的三人）	明初曾泰、辜梟、张诚三布衣也……生而庸诸朝，没而祀于乡，宜也。（熊廷弼 《正乡贤祀典与邑令书》）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到，一方面，康熙朝《江夏县志》与《灵泉志》的一些内容明显有着共同的来源，这是由于《灵泉志》中的一部分材料来自方志，特别是编纂者在考释其他材料时大量使用了方志。这一点，明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和万历《湖广总志》中的相关内容可证，由于篇幅的缘故，这里不一一列举。另一方面，《灵泉志》中的内容比《江夏县志》更加丰富有趣，这自然是因为它更多地来自民间文献及口碑传说。

总的来说，康熙朝《江夏县志》的编纂仍基本遵循明代县志“典而略”的原则。《湖广图经志书》中交代，其纂修“悉准《大明一统志》，遵时制也”，只不过“志天下宜简，志一省宜稍加详”，因此需要一些变通而已。但是即便如此，也仅仅是参考宋祝穆《方舆胜览》及郡县新旧志，“量为增入，不敢加一私见臆说，恐无征也”。[23]《湖广总志》则指出，“志即汉人掌故之书，虽因事铨述，无取闳衍”。[24]这些原则，从康熙二十二年志、康熙三十五年志的序言来看，基本上得到了沿袭。

然而，在严肃编纂原则下，地方史的色彩亦顽强地显示出来，最突出的表现是人物部分，这里以李姓谱系为例进行说明。

自明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始，唐人李善、李邕、李鄘、李磎已经被视为江夏地方的历史人物。有趣的是，在两唐书中，李善的籍贯等记载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下表。

表 4

《旧唐书》	《新唐书》
李善者，扬州江都人……尝注解《文选》……子邕，亦知名。（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儒学）	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侄孙。父暄，官至起居舍人。（列传第一百七）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从孙。（列传第七十一）
（鄘）子柱，官至浙东观察使。（列传第一百七）	（鄘）子拭，仕历宗正卿、京兆尹、河东凤翔节度使，以秘书监卒。（列传第七十一）
柱子磎，字景望……磎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列传第一百七）	拭子磎，字景望……磎好学，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列传第七十一）
（磎）子沆，字东济，有俊才。与父同日遇害，诏赠礼部员外郎。（列传第一百七）	（磎）子沆，字东济，有俊才，亦遇害，赠礼部员外郎。（列传第七十一）

《旧唐书》与《新唐书》各自的价值和缺陷，史料学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对于李善籍贯说法中的明显矛盾，亦有学者进行了考辨，[25]笔者由于学力所限，不敢置喙，惟从地方史的角度，提示地方志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

其一、康熙朝《江夏县志》李善等人的材料主要取自《新唐书》，这也许是因为《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渐趋式微，所以《新唐书》影响更大的缘故。当然，嘉靖年间《旧唐书》再次面世，编纂者已经有可能接触到。无论如何，康熙朝《江夏县志》中李善的籍贯取《新唐书》“江夏李善”的说法，有趣的是，县志中李邕的内容虽然也取自《新唐书》，但是对于其中“扬州江都人”一句则一字不提。

其二、两唐书中李鄘的儿子名字不一致，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取《新唐书》说法，因此有“李栻，鄘之子，仕历宗正卿、京兆尹、河东凤翔节度使，以秘书监卒。”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前述《旧唐书》至嘉靖之前尚不传的问题，只是“拭”字写为“栻”。至康熙抄本《江夏县志》，编纂者当已接触过《旧唐书》，其中交代，“（鄘）子柱，官至浙东观察使”。对于这样明显的矛盾，编纂者举重若轻地做了如下处理“李鄘，字建侯，邕从孙，父暄，官至起居舍人……子柱，官至浙东观察使，子栻，仕历宗正卿，京兆尹，河东

凤翔节度使，以秘书监卒。”[26]由于“拭”字此前已被改作“栻”，因此颇显得字派井然有序。

乾隆朝《江夏县志》

乾隆五十八年，时任知县的陈元京主持重修《江夏县志》。他在序言中交代了此次重修的缘起和背景：“制军毕重修《楚北通志》，命各州县刻日编辑以考其成。予因设局于本学明伦堂，进绅士而言曰：辖轩之陈，传闻恐谬，桑梓之地，耳目最真。此无问残碑断碣家乘野史，苟有可采，皆足以补纪载之缺。”[27]其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此次重修的《江夏县志》的特点。

其一，此次重修《江夏县志》的缘起是湖广总督毕沅重修《楚北通志》，即《湖北通志》，背景则是清廷在修志方面的规定，“雍正元年，清廷严谕各省县修志。清代形成了60年一修地方志书的传统”。[28]自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二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

其二，对地方绅士公布“无问残碑断碣家乘野史，苟有可采，皆足以补纪载之缺”的采录原则，无疑会导致此次收入县志中的材料较以往有较大尺度的开放。

比这两点更加隐晦的则是，由毕沅重修《湖北通志》可知有章学诚参与其中。乾隆五十三年秋，毕沅升任湖广总督，甚得毕沅青睐的章学诚到武昌投奔他，并继续自己的修志事业。五十六年修《麻城县志》，次年受任编《湖北通志》。[29]

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对于方志的性质，有所谓“地理书”与“史书”之争。至于清代，戴震与章学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颇为后世研究者所关注。根据章学诚的自述，戴震见到章学诚所编《和州志例》后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章学诚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说：“方志为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30]从章学诚的说法来看，他关注的还不仅仅是方志的性质问题，而是希望通过扩充方志的职能保存更多的信息，勿令因修志者个人的剪裁造成文献的丧失。

如果做大胆的推测，也许章学诚的修志思想在《湖北通志》的修纂过程中对各府州县志，包括《江夏县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陈元京动员地方绅士的“辖轩之陈，传闻恐谬，桑梓之地，耳目最真”一句，似由章氏的“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脱胎而来。[31]其“无问残碑断碣家乘野史，苟有可采，皆足以补纪载之缺”一句，似又从“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而来。[32]无论如何，能够从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看到的是，民间文献与口碑大量被采录，从而大大丰富了县志的内容。这里举一些例证，与康熙朝《江夏县志》的情况做对比。

1、山川名胜

“灵泉山，今俗又呼龙泉山……山祖丰禾，北行为省脉，分折而东为笔格峰，逶迤数里，起为龙帐峰，山麓有兴隆庵，南出为宝盖峰为圆通寺，横龙岭起为玉屏峰，又为天马峰，下为舞阳侯墓，宋张芸叟家此，至明而冢宰鹤山出。左为方伯杜竑及唐相李氏，右朝阳坡则元大学士沈嵩庵……形胜甲于一邑。”[33]在这一段文字中，舞阳侯指汉代的樊哙，被灵泉樊氏奉为祖先。[34]鹤山指明代的张添祐，称他冢宰是因为灵泉张氏谱记载他做过吏部尚书。[35]唐相李氏指前文分析过的唐朝李氏谱系中的李磎，灵泉李氏自认为是他的后裔。[36]而沈嵩庵指元人沈如筠，灵泉沈氏谱记载他曾是元顺帝时期的大学士。[37]这些信息在《灵泉志》中是被反复提及的，[38]但是除了张添祐的名字出现在以往方志的“选举”部分，表明他曾经中举并考中进士之外，[39]上述说法从未在其他官方文献中出现过。

“张诚湖，在县南九十里，明时为张氏湖，以简素得名。”张诚，即前文中不见于康熙《江夏县志》荐辟、乡贤部分，而《灵泉

志》中却记载与明初曾泰、辜皋同时以布衣为朝廷所征并名列乡贤祠的张诚，灵泉张氏谱载，简素为其谥号。[40]

“灵泉，在灵泉山，灵泉寺右……汉朱桃仙见之曰：‘此灵泉也，不可凿，凿之则雷雨至矣。’天宝末李舍人暄居此，凿之果然，泉大旱不涸……平章李磎有记。”此段文字来自《灵泉志》中传为李磎所做的《灵泉记》，原文为：“汉末有桃仙者，善卜地，寻龙至此。见两岸如门环似锋锷，有二巨石似獬兽状，泉涌然在磐阿中。桃曰：‘此灵泉也，不可凿，凿则雷雨至也。’迨天宝末，余家命匠人凿房屋基，雷雨大作……泉从石脊中流出……虽旱不涸。”[41]

“九峰寺，在九峰山狮子峰下，旧为唐李平章墓。明楚昭王出猎，逐白兔于此，见李氏墓，命掘其墓，将夺为寝，李后裔都御史盛死之，灵数与王较。王惧，募茶、盐二商出金巨万，作千佛殿以厌之。又修寺若干间如藏金之数，李祟犹不已，乃旁修李公享殿，塑像祀之。寺以居高僧无念，请旨敕赐。”从前文所列康熙朝《江夏县志》与《灵泉志》的对比可以看出，这段文字来自邹振奇的《建李都堂盛神像》。

2、典章制度

在“乡贤祠”部分，康熙朝县志中记载，江夏乡贤祠中祭祀的先贤是从明初开始的，乾隆五十九年志反映出这个限制被突破了，乡贤祠中开始祭祀唐代李邕、李鄘及宋代冯京等更早的历史人物。已知这些李氏名人的江夏籍十分可疑，而冯京在《湖广图经志书》中尚未被划为江夏籍，只是其父冯商作为流寓江夏之人出现。[42]与此不同，《灵泉志》中的内容说明，当地人早已将李氏名人认定为江夏籍且有后代，稍后冯京亦被认定为江夏籍。[43]乾隆五十九年志的做法则表示官府已经接受了这些说法，将这些籍贯并不明确的历史人物认定为“自己人”，并在制度上加以确认。

在“荐辟”部分收入了张诚。[44]无疑是吸收了民间的说法。

在“录荫”部分，新增明代张恒，“以父天祐荫太学生，对策授南昌府尹”。如前文所述，张添祐的名字见于以往方志的“选举”部分，但无任何官方文献记载他曾为吏部尚书，其子荫袭一事仅见于灵泉张氏谱：“（添祐公）长子字太参，以太学生上书任南昌府尹，为鲁王仪宾，入山东籍。”[45]

3、人物

在人物方面，唐代李氏名人的谱系进一步得到完善，灵泉李氏所强调的要素一一凸现，如“李鄘，字建侯，性纯孝，肃宗旌之，颜其堂曰‘蓼莪堂’”。[46]其中蓼莪堂是《灵泉志》中反复提到的胜景，在楚藩霸占灵泉山，赶逐“八大家”之前，是李氏的产业。

对于前文提到的两唐书中李氏名人籍贯的矛盾，乾隆五十九年志也尽最大可能进行了弥缝。经过“分析”之后，编纂者下“定论”曰：“李邕，字太和，善之子，善本江夏人，侨居扬州江都。”[47]

在“孝子”部分，增加了“汉，黄香”，编纂者加按语云：“《后汉书》以香为江夏安陆人，《通志》因之，并云香、琼墓皆在安陆县，故郭、张二志不入，潘志载之，亦未详所据。”乾隆五十九年志之所以增加了这个人物，是因为“张璞《黄公乡记》云：《汉名臣传》载，黄琼自叙年谱里居在江夏五谷岭，又汉唐古志，琼墓在青石邑，琼祖墓在黄陵山东南，今黄陵山地有五谷城青石店，乡老云今之五谷城即黄公乡，今蔡氏庄即黄公墓”。张璞的这篇文字，在《灵泉志》中亦可以找到，不过题目为《黄公乡志》，内容也有一些不同。[48]

此外增加了一些人物，有关这些人物的材料与《灵泉志》中的材料对比如下表5。

总之，通过与《灵泉志》的对比，可以看到乾隆五十九年志收入了来自灵泉地方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以往从未被方志所取，是因为它们在正史中无考，只有民间文献有所记载或口碑流传。

同治朝《江夏县志》

同治八年，知县王庭桢重修《江夏县志》。此前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江夏因附郭省治，‘城陷至再三’，文献损毁严重，‘不独邑中文籍荡然，即大府宪□亦皆图书散

表 5

乾隆五十九年志	《灵泉志》
张舜民，字芸叟，先世洛阳，自张谔官鄠州致仕，家于江夏之湘东里，徽钦南狩时祖枢密叔夜、父状元栋、祖母蔡、母王阎室殉节白沟河，舜民年时十二，亦将赴井，大将张勇抱持恸哭，贼哀之释去。勇乃奉舜民奔江夏之灵泉山，力耕以给，锄地得金巨万，乃聘致名儒，讲求性命之学，立祠刻四像，日夕拜酹，终朝诵哭不绝声，理宗授太守，有《南迁录》。 张文渊，弟文潜，舜民之子，皆有文行，居官以循良著。（卷十，行业）	故枢密使张叔夜勤王死事，终于白沟河。妻蔡氏、媳王氏，俱投井。长子伯奋、次子钟熊抗志不屈，痛哭自刎，三子张栋死于太白山下……查得栋子舜民，逃往江夏，特着地方官修祠立坊，以旌忠节子孙，世补太学生员一人，奉祀生一人，三年授太守，永垂祀焉。（《宋理宗诏封忠节坊》）
沈如筠，字无回，号嵩庵，本南昌籍，仕元为观文殿大学士，见元末世乱，弃官隐于楚黄，复徙江夏之灵泉山家焉。明洪武初征不起，置义田四百亩，积谷于宝峰寺中，以赡贫士。	昔我沈公，讳如筠，字无回，号开平先生，自元英宗至治二年成进士，历顺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升观文殿大学士，与首相伯颜哈麻有隙，为相仅十个月，屡疏奏，未几谢职，挂冠而归，隐楚黄，转徙江夏，居灵泉山。（张添祐《沈氏家谱序》） 元相沈如筠，置义田四十石于寺中，以助寒士。（何炌：《宝峰寺义田志》）

失。”[49]至于县志，自乾隆五十九年之后，已近百年未修，且“兵燹后故籍无存，仅求得旧志残本”。[50]这种情况使得编纂者以为乾隆五十九年志是仅存的版本，“乾隆以前旧志不复见，唯最后之陈志仅存，大约本于张、潘诸志”，但是认为它水平不高，“采辑未精，不可为典要”。[51]事实上，我们知道康熙年间所修县志仍保存了三种，虽然有缺文。

与乾隆五十九年志相比，同治八年《江夏县志》沿袭了“无问残碑断碣家乘野史，苟有可采，皆足以补纪载之缺”的原则，而更重要是的，此次修志者得见《灵泉志》，[52]并对其中的内容大量予以采纳。

1、山川名胜

表 6

同治八年志	《灵泉志》
含山楼，在灵泉山，宋张芸叟避乱拘此，尽有灵泉之地，元末毁。明初鹤山吏部重建，有亭二，左春露，右秋风，前为张氏宅，后楚藩废为昭寝。（卷二，疆土志二，杂置，古迹附）	含山楼（张芸叟避乱至此所拘，楼在天马峰下——此原为小字体，为编纂者所加。笔者注。） 含山楼亦张芸叟建，在灵泉山天马峰下，甚为钜观。元末毁，明初张鹤山吏部重建左右亭二，曰春露、曰秋风。前为张氏宅，后楚藩为昭寝。（沈如筠《含山楼》）
寻乐斋，在灵泉山峡口，即紫萼园故址也。有精一轩、花萼园、卧云馆，为明洪武时张诚读书处，后为宪寝。（卷二，疆土志二，杂置，古迹附）	寻乐斋（张诚书房，吏部张添祐少时读书处，斋址系李道宗紫萼园旧基。今为宪寝——此原为小字体，为编纂者所加。笔者注。） 简斋张先生，筑书斋于灵泉之北，题其亭曰“精一轩”……闻书声朗朗，如出金石，则张子添祐也……轩后曰花萼园。（沈如筠：《寻乐斋》）
灵泉古市始于汉，迄唐浸盛，时市在山外，相传宋张芸叟锄地得金巨万，列廛召商集至数百户，元则蔚然大镇，后毁于红巾贼，明初复聚，阛阓闲闵，烟云浡郁，张、沈、邹、杜、樊、曾、董、李，里称八达者为最，今其地即楚藩九寝。（卷二，疆土志二，杂置，古迹附）	自汉以来，人物尚稀，至唐而渐盛，至元而极盛。唐时古市在山外，居聚致货，民往往利之，宋时迁市于内，约有数百户，至元时则蔚然一都会矣。未几为徐寿辉刘福通二贼所洗，一片荒墟在望，人物俱尽，国朝洪武初时，张、沈、邹、李复起为集，五十余年。比宋元更有加焉。（樊镛《灵泉山记》）
张诚墓在灵泉山骆驼湾庄寝前，墓以雷鸣七日得不掘。张璞墓在灵泉山天马峰左，《灵泉志》璞葬用石椁，为楚藩所凿，见棺鲜明，附葬于左。（卷三，礼乐志五，祠庙，陵墓附）	张公（张公即张诚——此原为小字体，为编纂者所加。笔者注。）之骆驼卸宝，实自天葬，非人为也。诚得石穴为天葬。楚庄薨，欲凿其穴，雷雨数日乃止。（沈世昌《地理闲评》） 今臣祖张璞为先朝骨鲠之臣……蒙赐遗骸，归葬江夏东祖茔灵泉天马峰下，已有年矣。惨遭楚王府宗朱掘冢开棺……（张廷鸾、张廷凤《再参楚藩本》）

2、人物

表 7

同治八年志	《灵泉志》
张叔夜，官枢密院，勤王死难白沟河，妻蔡氏媳王氏俱投井死，长子伯奋次子仲熊抗志自刎，三子栋死太白山下。（卷十六，人物志十一，忠臣）	故枢密使张叔夜勤王死事，终于白沟河。妻蔡氏、媳王氏，俱投井。长子伯奋、次子仲熊抗志不屈，痛哭自刎，三子张栋死于太白山下。（《宋理宗诏封忠节坊》）
张芸叟先世洛阳，自张谔官鄂州致仕，家于湘东里，徽钦南狩，时祖枢密叔夜、父状元栋、祖母蔡、母王阖室殉节白沟河，芸叟时年十二，亦将赴井，大将张勇抱持恸哭，贼哀之释去。勇乃奉芸叟奔灵泉山，力耕以给锄地得金巨万，乃聘致名儒，讲求性命之学，立祠刻四先人像，日夕酹哭不绝声，理宗时敕建坊授太守。（卷十六，人物志十一，政绩）	宋张舜民，字芸叟，状元张栋子也。母王氏，俱尽节，载烈女传……舜民建炎时至灵泉，天姿敏达，志量不群……义士张勇，善治农桑，家用饶足。舜民与勇锄圃，得金数瓮，买荒田三百亩。积溪水，蓄鱼苗，采松花，种茶乳，卒致大富……宋理宗敕赐忠节坊，以表叔夜及栋并母蔡氏，栋妻王氏之烈。舜民终身恸哭，刻四像于祠，日夕拜礼，纯孝无间，至老不衰。（《张舜民传》，编纂者于题下加小注：舜民，宋理宗授太守，著有《南迁录》）

值得注意的，对于以往方志中采择的信息，同治八年《江夏县志》的编纂者亦做了一些考据工作，不知是否与乾嘉以来的学风相关。

如，乾隆五十九年志中提到的灵泉张氏的江夏始迁祖张芸叟，同治八年志的编纂者考曰："旧志芸叟讹芸叟作张舜民，与张叔夜无涉，芸叟乃叔夜孙，今改正。按：叟，古蒐字，《说文》作叟，入申部。"这是因为乾隆五十九年志中记载张芸叟字舜民，是对张氏谱中记载的讹传，[53]目的是为了与历史上的名人拉上关系。而考之正史，芸叟为北宋文学家、画家张舜民的字，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破绽。于是同治八年志予以纠正。但是，无论是张芸叟，还是张芸叟，编纂者并不否认他与张叔夜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没有否定灵泉地方史或者张氏家族史的关键环节。

又如，唐代李氏名人的谱系，同治八年志对于李鄘之子的两歧记载是这样处理："子拭，仕历凤翔节度使，以秘书监卒。旧志云鄘子柱、栻。按唐书，无柱，栻作拭，今从之"。应该是采取了《新唐书》中的说法。对于李善籍贯的两歧记载是这样处理的："《曹宪传》称江夏李善，杜少陵有《哀秘书监江夏李邕》诗，旧志传修静寺为北海故宅，李白题诗有'我家北海'语"。均有利于证明其籍贯为江夏。不仅如此，"邕子暄，避难灵泉山下，后为中书舍人，暄子鄘以孝闻"，后裔犹居永丰里。等语，则干脆本于《灵泉志》，经过一番考据，最终得出结论"唐史之江都误矣"，否定了李善的江都籍贯。更进一步的是，两唐书记载中李磎之子为李沇，而灵泉地方有沈子澥，"在夹山里，乾道初才人李沈构书斋于宝峰寺左后，人以其名称之"。[58]《灵泉志》讹"沇"字为"沉"字，遂又将"李沈"讹为"李沉"，将沈子澥转为"沉子澥"，从而与李磎之子挂钩。同治八年《江夏县志》虽未如此冒失，但是指出，李沈为"平章之后，事亲以至孝"，即指李沈为李磎之子。

总之，通过与《灵泉志》的对比，可以看到同治八年《江夏县志》进一步采择了大量来自民间文献的材料，直接援引《灵泉志》中的材料，从而与后者在地方史的建构上形成了合谋。

结语

自民国时期开始，方志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学者的普遍注意，尤其是它们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如吴宗慈所指出的"正史二千年来之记载，只有国家而无社会。然则方志之所重者，诚有超乎正史之上者。"[59]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背景下，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得到了空前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后，地方志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强调，地方志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利用。[60]

按照研究者对于史料的一般性认识，方志的客观性要远胜于族谱等民间文献。原因之一，方志为官修，又往往集众人之力量，不致过于偏颇；原因之二，方志记述一方之事，不

为一家一姓服务，亦不致过于狭隘。因此，研究者对于方志中的材料大多放心使用。

对此，近来已有学者撰指出，不仅应该注意到地方志编纂过程中的“前见”，而且应该通过将其视为一种“文本”，揭示其制作过程中暗含的权力、观念、目的和意义。如是，“不仅可以梳理出这一历史时空中的方志编纂史以及方志编纂者的认识史，也完全可能以小见大，借此重建和阐释其中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内容”。文章还特别指出，因为县志占据着现存方志的绝大部分，大多县域均存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便于作历时性分析。[61]

非常幸运的是，《江夏县志》恰好具备这样的特点。现存有清代的五个版本，并有明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万历《湖广总志》以及民间文献《灵泉志》，使我们既可以进行纵向对比，看到历史的“加减法”（葛兆光语），又可以进行横向联系，观察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之间的相互影响。限于篇幅，且因为笔者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无法全面揭示《江夏县志》“制作过程中暗含的权力、观念、目的和意义”，仅希望通过上述紧密围绕文本的分析，再次提示即便是对于所谓官方文献亦不能理所当然地加以利用，而应该了解文献的产生变化过程。同时，通过分析这一过程，特别提示对文献脉络的重视。文献的传承与诠释，从来是中国历史延续与发展的依托，并且从来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从内容来看，历次所修江夏县志都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然而，这并不会导致它们陈陈相因，对于正史的巧妙处理以及对民间文献的吸收利用，都在一步一步地丰富和延长江夏地方的文化与历史。[62]

＊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成果，项目号 2010CXTD10。

①明代以前已有《灵泉志》，被当地人称为灵泉古志，笔者以为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为明末清初之《灵泉志》所吸收。

②之所以为善本二字加引号，是因为汤氏兄弟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考据名义之下强化了地方史的建构，参见笔者即将完成的论文《地方史的脉络与精神——湖北江夏〈灵泉志〉研究》（暂名）。

③《武汉市志·科学志》指出，清代《江夏县志》的编纂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五十三年、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参见该书第 93 页，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此说有误，见下文。

④ 事实上笔者也正是因为以《灵泉志》中的材料为中心来查阅资料、寻找线索，才注意到《江夏县志》在历史上的变化过程。

⑤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清代以来地方志编纂问题述论》，《史苑》第 12 期。

⑥“刘朝英，字千夫，三韩人，知江夏，廉明清慎，勤劳国事，时滇黔倥傯，军供猬集，公多方措办，无哗卒亦无困民。每朔望必率师儒耆老宣讲上谕，加意学校，捐资课士。刊有《雄楚编》，康熙二十二年修辑邑乘，以疾卒于官。”“张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己酉举人，任江夏教谕。日与诸生讲论经义，暇则命题课文，定其甲乙。县令刘公朝英延请纂修邑乘。康熙二十四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官翰林侍讲，提督浙江学政。”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十六，名宦。

⑦“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年，征拜詹事，复为东宫讲官。旋擢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家居十年卒。后四年，赠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十四。

⑧康熙二十二年《江夏县志》张希良序。见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

⑨“魏廷谟，字溟一，明诸生也。高才博学，性恬淡，绝意仕进，好读书，年九十犹事笺注，手不释卷。生平和易款曲，不立崖岸，至大节所系，凛凛乎绳尺不逾，前辈钟退谷讳鹄湾辈皆引重之。留心邑乘，其所述张太史尝取资焉。”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十八，人物，隐逸。

⑩康熙二十二年《江夏县志》张希良序。见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

⑪ 他自述“向尝从事通志之役未就”，可见曾经为修《湖广通志》做过准备。

⑫⑬ 康熙二十二年《江夏县志》，江夏知县刘朝英序。见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

⑭“洪国辅，字左薇，梅溪人。”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十五，秩官。

⑮ 指崔颢、弥衡。

⑯ 指夏逢龙之变。

⑰ 康熙三十五年《江夏县志》知县洪国辅序。见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

⑱“陈万策，字□□，奉天人。”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十五，秩官。
⑲康熙五十三年《江夏县志》陈万策序。
⑳“潘窀鼎，字实夫，溧阳人，进士。”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卷十五，秩官。
㉑康熙六十一年《江夏县志》满丕序。
㉒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旧志序跋》，第165页，武汉出版社，2009年。
㉓明成化薛纲纂修、嘉靖吴廷举续修《湖广图经志书》，凡例。
㉔明徐学谟纂修《湖广总志》，志凡。万历二年至四年刻本。
㉕刘会胜、李娅《李善、李邕籍贯及世系考辨》，《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1期。
㉖康熙抄本《江夏县志》，先贤。
㉗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陈元京序。
㉘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清代以来地方志编纂问题述论》，《史苑》第12期。
㉙陈蔚松《章学诚与〈湖北通志〉》，《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章氏遗书》卷十四，台北汉声出版社，1973年。
㉛㉜语出章学诚《修志十议》，见《章氏遗书》卷十五，台北汉声出版社，1973年。
㉝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卷一。
㉞“樊时中之谱，出唅苗裔，相传武昌为樊封侯地，故有武阳樊侯之名，樊山、樊湖之称是已。而说者谓灵泉为唅之墓，樊山为其母之墓母墓，为唅母墓，樊氏子孙，所世守而祧祀之者。”张添袖《樊氏谱记》，《灵泉志》。
㉟“添袖公，字仁一，号元祯，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殿试探花，恩赐翰林及第，官吏部尚书。”灵泉张氏谱。
㊱“先世远祖李鄘，字建侯，由天宝末年举进士，官拜平章，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朝廷赐葬九峰狮子墩上，李善、李邕、李暄合计四墓，丰碑高堑，石马翁仲，凿凿可据，历今九朝，千百余年矣。”李璋《陈抄家草稿》，《灵泉志》。
㊲“如筠，字无回，号开平，元英宗至治二年成进士，历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升观文殿大学士。”灵泉沈氏谱。
㊳这些记载主要来自编纂者当时能够看到的族谱。笔者在江夏找到了樊、董、张、李、沈五姓的族谱，其中张氏谱与沈氏谱因保存了年代较为久远的信息，可以部分印证或纠正《灵泉志》中的说法。
㊴这一点可以为明清进士题名碑所证实。
㊵“张诚公，字应玄，谥简素，举孝廉，赐翰林，赠吏部尚书。”见灵泉张氏谱。
㊶李磯《灵泉记》，《灵泉志》。
㊷《湖广图经志书》，卷之二，武昌府。
㊸从《灵泉志》中搜集的材料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时差。
㊹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卷七，选举。
㊺灵泉张氏谱。
㊻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卷八，孝子。
㊼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卷十，行业。
㊽张璞《黄公乡志》，《灵泉志》。
㊾同治八年《江夏县志》王庭桢序，台北成文书局版。
㊿同治八年《江夏县志》邑人彭崧毓序。
(51)同治八年《江夏县志》凡例。
(52)笔者之所以认为同治八年志的编纂者得见《灵泉志》，而乾隆五十九年志的编纂者有可能尚未见到，是因为：一、从抄本《灵泉志》及现存灵泉沈氏谱中的内容来看，汤氏兄弟与重修家谱的沈氏族人均于嘉庆年间见到了《灵泉志》。二、乾隆五十九年志中虽然亦出现了与《灵泉志》中相似或相同的内容，但是基本限于《灵泉志》所搜集的族谱等材料的范围，这些材料离开《灵泉志》亦能得见；而离开《灵泉志》就无法见到的编纂者加以评点或考释的部分并未出现，同治八年志中则出现了这些内容。三、同治八年志的编纂者直接注明部分材料来自于《灵泉志》。
(53)张氏谱中写为训民，但笔者亦不敢肯定《江夏县志》或者《灵泉志》有误，这是因为笔者不能确定所见张氏谱的修订时间、是否传抄有误，而且，在现在的当地发音中，训民与舜民听起来没有区别。
(54)乾隆五十九年《江夏县志》。
(55)吴宗慈《方志丛论》，1947年。转引自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清代以来地方志编纂问题述论》，《史苑》第12期。
(56)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57)李晓方《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
(58)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灵泉志》看到，在更早些时候，灵泉地方社会也曾通过吸收和利用官方文献丰富和延长了灵泉山的历史。